

# 失落的世代：以吳濁流為例看戰後初期的台灣本土報人<sup>\*</sup>

邱家宜<sup>\*\*</sup>

## 摘要

本文從前殖民地智識分子的失語困境與認同掙扎來論述吳濁流如何在戰後發展出他的「亞細亞孤兒意識」。其所代表的台灣本土報人這一脈，雖然一度在國府強力的文化霸權掌控中，透過「選擇性傳統」的運作而幾近湮滅，成為「失落的世代」，卻又在解嚴後的社會環境中，透過另一波「選擇性傳統」的過程死灰復燃，成為理解當前台灣媒體生態的重要角度。

**關鍵詞：**失落的世代、台灣本土報人、吳濁流、亞細亞孤兒意識、選擇性傳統

<sup>\*</sup> 感謝兩位匿名評審所提出的批評與修改建議，讓本論文得以在論證面向上更為周延，在文獻的引用與耙梳上更為完整、細緻。

<sup>\*\*</sup> 邱家宜為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Email: eve59.chiu@msa.hinet.net。

## 壹、前言

過去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吳濁流是一個小說家、文學家，但本文將把他當成一個報人來研究。本文即將要論述，吳濁流不但堪稱報人，<sup>[1]</sup>而且其所代表並繼續被傳承到現在的，那種經歷被殖民者自我認同掙扎、揉雜有「亞細亞孤兒意識」的情懷，對於理解目前台灣的新聞媒體生態以及社會現狀，都具有相當的解釋力。

本論文所使用的主要文獻包括吳濁流的兩本自傳體小說《台灣連翹》與《無花果》，自傳、回憶錄係出自傳主本人親筆，是歷史研究所講究的「第一手資料」。張良澤所編的《吳濁流作品集》1-6冊，則對吳濁流一生的創作歷程與內容提供了相當完整的輪廓。由於本文是要藉由吳濁流的生命史凸顯台灣本土報人，以及其所處的整個世代台灣智識分子的集體命運，<sup>[2]</sup>除了主角吳濁流，其同時代人物，如林呈祿、葉榮鐘、吳三連、黃旺成、張月澄（張超英之父）、李登輝、黃茂盛、葉石濤等人的回憶錄、口述記錄、傳記文字等也都在本文參考、引用範圍。

在所借助的分析概念方面，本論文借助社會學者蕭阿勤（2008）在《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一書中，對德國學者 Karl Mannheim 世代概念的分析，來說明本文對世代概念的使用。並受台灣史學者周婉窈引用法國年鑑學派史家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之世代概念來理解日治時期成長之台灣人的啟發，進一步論證吳濁流的生命歷程正是「失落世代」的典型。本文另外再提出英國文化史家 Raymond Williams 的「選擇性傳統」（selective tradition）概念，嘗試進一步解釋這「失落的世代」如何以一種沉潛幽微，但卻暗潮洶湧的方式影響了後來台灣歷史的發展。荊子馨的「亞細亞孤兒意識」分析，也對吳濁流所代表的前殖民地智識份子的複雜心理狀態提供了相當深入的描述。吳濁流及那個「失落的世代」的台灣本土報人，所留下來的文化遺產（legacy），正以其特有的方式繼續影響著今天的台灣報業（新聞媒體）。而這整個故事必須從戰後的台灣社會說起。

## 貳、戰後的台灣社會

### 一、看似相似而彼此陌生的人們

台灣社會學研究先驅陳紹馨曾經指出，台灣因為各種因素複雜交錯，形成十分獨特的歷史經驗：

在此小地域，除了中國文化以外，還有山胞、荷蘭、西班牙、日本等諸文化的湊會。據台半世紀間，因日人嚴格管制台灣與大陸間的交流，在台灣的中國人成為「封閉性人口」，在這種情形下，台灣成為一個「實驗室」……。（陳紹馨，1979：5-6）

由於台灣割日後與中國的歷史經驗出現長達半世紀的斷層，兩岸在各方面都出現明顯差距，台灣社會或許並未完全或大體同化於日本，但卻也因為在一定「封閉性」下，演變出與中國大陸相當不同的面貌。

被日本殖民半個世紀的台灣，二次戰後重新成為中國的領土。相較於對日治晚期「皇民化」運動的抗拒（吳三連、蔡培火、陳逢源、林伯壽與葉榮鐘，1971），台灣本地智識階層對回歸中國，在一開始時是以全心擁抱的。1945年國府接收台灣時，民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盛況，深刻的留存在許多人的記憶中，並見諸文字記載（吳濁流，1988：138-141；葉明勳，1995：101-102；葉榮鐘，1985：286-287）。然而，在分治的五十年間，中國已從清季進入民國，並經歷軍閥混戰、國共鬥爭與一場幾乎耗盡國力的對日抗戰；台灣則在經過明治維新現代化過程（武安隆、王家驊，1984；姚大中，1988）的殖民主日本的轄下，透過有「六三」特別法而不受日本國內法規範，得以大權在握的總督府（Bloch, 1953 / 周宛窈譯，1989：32），建立了包括基層教育、戶政、警政、灌溉工程、道路運輸等軟、硬體基礎建設，以及偏重農業與農產初級加工的殖民地經濟（矢內原忠雄，1929 / 周憲文譯，2002；柯志明，2006）。由於長達半個世紀的歷史經驗殊異，戰後的台灣社會，對這個雖原為同文同種，但歷經改朝換代，撤而復返的政治宗主，事實上相當陌生。

透過新聞記者的眼睛，讓我們嘗試想像 1945 年初秋，當台灣重新成為中國的領土，雙方彼此遭遇時的場景。1945 年 10 月 5 日，與第一批國府接收人員一起來到台灣的中央社記者葉明勳這樣描述當年的情景：

當我們的專機在台北的松山機場降落時，剎那之間，我們的感覺，與初履日本國土沒有甚麼差異。滿眼的日文，滿耳的日語，大街小巷的木屐聲。我到台北後，首先須突破生活與語言兩道陌生的屏障。（葉明勳，1995：99-100）

同樣的陌生感也出現在戰時（1941）一度前往上海日軍佔領區謀事的吳濁流身上，他回憶自己第一次抵達中國：「我發覺到一句話也聽不懂。雖是自己的祖國，但予人感受卻完全是外國。」（吳濁流，1988：122）

1946 年從上海到台灣進行採訪工作，並在台灣住了兩年的記者江慕雲，引用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成員甫抵台灣時的印象，來形容戰後台灣民眾對祖國的陌生感：

車抵永樂町的永樂旅社門口，四周圍滿著人，聽說他們要看看祖國來的官員們的臉孔，是不是和他們一樣的。我們鑽出汽車後，他們圍攏上來，直像爭看新嫁娘一樣。有兩個中年婦人看到轉身回去說：「中國人和我們台灣人一樣的。」……我意識到；這必然是五十年隔膜而引起的誤解。（江慕雲，1992：11-12）

除了一般民眾對中國的陌生感，日治時期就在台人自辦的民營報紙《台灣新民報》，以及「六報合併」後在《台灣新報》擔任主筆的葉榮鐘，<sup>[3]</sup>對光復之初台灣智識份子對「近代祖國」的陌生，也曾有過生動描述：

台人對於近代祖國，全國統一以後的情形尤為隔膜。……譬如「擁護領袖」、「軍隊國家化」一類的文字，就覺得很陌生。……國民對元首的崇敬愛戴，自是天經地義，何必侈言擁護。至於「軍隊國家化」，使我們發生國家以外，還可以有私設軍隊的疑問。以後雖然逐漸明白其所以然，可是在當初，確實是莫名其妙。（葉榮鐘，1985：291-292）

剛打完對日八年戰爭的大陸來台人士，對日本的一切打從心底厭惡、敵視，但偏偏進入一個被日本統治了半個世紀，許多方面都受日本文化影響的台灣。1946年底，新竹市政府下令嚴禁市民穿日式兩齒木屐，派警察到木屐工廠要求禁止製造，但中式無履齒木屐則不在禁止之列，當時《民報》還刊出一篇社論諷刺此事，認為同樣是腳底穿的木屐，有齒、無齒竟有霄壤之別（〈談談禁用木屐〉，1946.12.25）。

雖然半世紀的隔閡，已經形成彼此間的明顯差距，但戰後政治情勢的驟變，使這原屬兩邦的人們必須以最快的速度變成同一個國家，但要復歸統一，問題較之想像中更為複雜。「歷史進程讓他們突然面對面，彷彿外星人的首度對撞。這種不理解像瘀傷，很快就惡化為膿。短短十四個月以後……終於以悲劇上演。」（龍應台，2010：241）吳濁流與其同一時代的許多台灣本土報人，就是處在這種政權一夕交替，新文化霸權（國府所代表的「中華文化霸權」）急於取代原有文化霸權（日本殖民政府所代表的「大和文化霸權」）往往顧不得手段粗暴時期的台灣社會中，他們在個體各自不同的機緣與遭遇中，也承擔了整個世代的共同宿命。

## 二、語言轉換的困局

語言與文字所造成的溝通障礙，是戰後台灣社會的普遍經驗。經過五十年日本殖民統治的「國語（日語）普及」政策，及對漢文採取的「漸廢」政策，有系統、全面性的對台民實施日語教育，加上二戰後期具強迫性的「皇民化運動」也以推行日語為重心，到了1944年，台灣社會中，能使用日語者超過七成（吳文星，1996：296）。更寬鬆

的估計數字則是在 1943 年年底，有 80% 以上的人口已經是「國語解者」了（周婉窈，2009）。

1946 年 2 月創刊的《新台灣》雜誌，在創刊號中提到，當時的台灣社會中，三十歲以上的知識份子，懂漢文者只有百分一、二，三十歲以下的更少（許雪姬，1991：158）。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也曾回憶，光復之初，台灣大學化學系諸多教授中，僅有一位劉姓教授會說流利的國語（李西勳，1995：175）。歷史學者許雪姬進行口述歷史研究，訪問文學家葉石濤與學者謝爾昌，發現在日治時期受教育的兩人，都是戰後才開始學北京話，之前是連台灣話（福佬話）也不會說的，她據此判斷在 1945 年的終戰前夕，台灣已經是日文的世界，不要說是「國語」（北京話），就是各種地方母語方言，也已不是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共同的語言。日語成為台灣知識界最普及的也是共同的書寫文字（許雪姬，1991：158）。

我們還可以舉出更多的例子。1931 年出生的戴國輝已算是日治後期成長的台灣子弟，但他自承戰後他不但不能說北京話，當時連母語客家話都講不好，與他同輩的朋友們大部分也都無法用漢字寫信（戴國輝，1994：64）。戴國輝的剖白，透露了在日本殖民政策下，台灣社會與中文及中國官方語言（北京話）幾乎呈現脫節的狀況。終戰那年，生長於台北礦業巨賈之家的張超英剛考上台北二中（今之成功高中），他回憶當時：「老師來自大陸各地，南腔北調，課堂上經常因聽不懂而懊惱萬分。我們上了初中才開始學ㄅㄆㄇㄏ，中文完全重新學起。」（陳柔縉，2006：99-100）李登輝的經驗也相當類似。他在二戰後期（1943 年）到日本念京都帝大，但因為前線吃緊被日人徵召入伍，日本戰敗後，他輾轉回到台灣時「連中國話也不會說，中文不會寫」（張炎憲主編，2008：123），轉入台大農經系繼續上大學時，中國（大陸）來的教授用中國話（帶有濃重各省鄉音的不標準北京話）講課，日本籍教授用日語授課，台灣籍或客家背景的教授也還是得用日文，由於當時台大校內未禁止日文，台籍學生們仍通用日語，他回憶：「我們交換意見也是差不多都用日文」（同上引：143）。社會學家葉啟政如此形容他那在青年時期進入國府統治階段的父親，與其形同「功能性文盲」的同儕：「語言上的障礙使得他們喪失了接觸更大、且極

其不一樣之世界的機會，也使得他們喪失了向更大世界表達他們的思想與感情的機會。」（葉啟政，2005：252）

社會學者王甫昌指出，在台灣光復以後，特別是在大陸撤退之後，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並沒有共同的語言或文化。在日本統治下達五十年之久的本省人，所使用的語言是日語及台語（或客語及其他母語）；除了極少數較年長的一代，多數本省人不能讀漢文（王甫昌，1993：70）。1945年終戰後，來台接收的國府官員、公務員、軍隊、軍眷或商民使用中文（文字），與大陸各省方言（語言），台灣當地則通行日文（文字）、日語與閩客等方言（語言），語言不通的比手畫腳是常見的場景。但不同於日本殖民者對漢文採取「漸廢」的相對緩和策略，國府治台的語文政策則是劇烈的一夕更張，報紙日文版的全面廢止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國府從日本人手中接收台灣後，將原台灣總督府監辦的《台灣新報》改為《台灣新生報》，由自重慶返台的雲林子弟李萬居擔任社長，這份官營報紙是當時台灣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剛開始仍為中、日文並刊，但陳儀所領導的行政長官公署決定在1946年10月25日所有報紙必須全面廢止日文欄，這對當時尚無法閱讀中文的大多數識字人口，形同剝奪了閱報權。由於台灣回歸中國才短短一年，要數百萬人民這麼快就掌握另一種語言、文字，是緣木求魚，所以在當時曾出現許多反對聲音，甚至有具臨時性民意機關性質的縣市參議會正式通過議案表達反對意見（何義麟，2005.07：8）。社會中習用日文而不懂中文的青年人，也發出「禁用日文如同喪失發言機會，與剝奪言論自由無異」的憤怒抗議，認為當局是藉語言政策之名，行壓制反對言論之實（何義麟，2007：200-201）。除了讓慣用日文、日語的青壯人口產生受壓迫感，禁用日文政策的雷厲風行，也讓報紙發行量遲遲無法增加（羅敬典，1952）。

1945年終戰後，由國府接收的台灣，在「回歸祖國」與「光復台灣」的短暫歡欣之後，接下來的，是對統治者與被治者都充滿實驗性的艱難任務——如何在最短時間內，把台灣從日本變成中國。對統治者來說，為了在最短時間內把各個層面上都已經開始日本化的台灣社會再度變成中國的一部分，歷史記憶的選擇性抹除與重塑、再造成為必要

的工程，欲於此圖，除了國民教育體系之外，掌握論述生產的大眾媒體當然是第一個要拿下的陣地；對戰後台灣人民來說，他們過去五十年被強力教育要成為日本人，驟然間卻面臨必須全然否定過去的難堪處境。像吳濁流這樣嫻熟日文更勝中文的智識分子，在戰後國府極力去除日本統治痕跡的情況下，已難逃被邊緣化，甚至幾乎被埋入歷史灰燼的宿命。

## 參、吳濁流——苦悶的殖民地智識分子

### 一、多重語境

吳濁流本名吳建田，1900（清光緒二十六年、日明治三十三年）生於台灣新竹新埔地區的小地主之家，是家中三男（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1977）。從他的兩本自傳《無花果》（吳濁流，1988）、《台灣連翹》（吳濁流，1995）中我們大致可以勾勒出他的家世背景。吳家是從廣東鎮平縣移民到台灣的客家人，經過他高祖父與曾祖父兩代的勤奮積累，他的曾祖父成為地方首富。到了祖父時家道一度中落，他的父親又力振家聲，頗有局面。他自幼隨深具避世氣質的祖父吳芳信起居，漢學深厚的祖父於是成為吳濁流的第一道文化淵源。

吳濁流的母語是客語，日語是第二語言，也是官方語言。他十一歲入公學校一年級時，為了不落後年齡多半比自己還大的同儕而非常用功：「祖父說，時常聽到我在夢中念『阿伊烏ㄟ喔』」（吳濁流，1988：51），這是吳濁流人生中所遭遇的第一次語境轉換。六年公學校畢業，他以優異成績，考入台北的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在家鄉子弟中拔尖的吳濁流，於國語學校就讀時，一度卻因為日語發音不正確吃盡苦頭（同上引：67），這種語境轉換的焦慮，後來一再出現在吳濁流生命中的各階段。

第二次的語境轉換出現在1941年。他因為不能忍受殖民統治下的苦悶、侷促，滿懷憧憬的從台灣西渡到日本佔領下的南京尋求發展，但卻因為不會說北京話，想在汪精衛政府下謀事碰了釘子（同上引：126）。雖然在親日中國人組成的政府中找不到工作，卻因緣際會的進入日本人辦的《南京大陸新報》任職，展開他人生第一段記者生涯（同

上引：129），當時在工作上所使用的，當然也是日文。由於正式受教育是從日制公學校開始的，加上這段經歷的印證，可以看出，吳濁流用以書寫的第一文字應是日文無疑。<sup>[4]</sup>

第三次語境轉換經驗（也可以視為第二次語境轉換的延長），則是在戰後。國府接收台灣後，之前即已任職《台灣新報》文化版記者的吳濁流，繼續留在李萬居負責接收改組的《台灣新生報》，負責將中文譯為日文的編譯工作。之前在南京曾經勤練的「中國話」開始大大派上用場，但終其一生，吳濁流的對外溝通始終未能完全擺脫語言轉換的錯亂窘況。連他的忠誠文友、忘年之交張良澤都提到每次跟吳濁流講話：「國語夾雜日語；而國語又是客家、閩南參半；至於日語，不知是我的聽力差還是您的發音不正確，總共合起來只能聽懂七分。」（張良澤，1977：5）同為客家人的文友林海音也提到：「他的國語夾雜著濃厚的客家鄉音，我雖也是一半的客家人，但即使他完全說新埔客家話，我也不懂。」（林海音，1977：35）。連十分熟稔的文友、晚輩們與他都存有明顯溝通障礙，更遑論其他。根據前面所舉的葉石濤等例子，吳濁流的這種「失語困境」，當時普遍出現在戰後初期台灣的智識份子之中。

戰後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全面禁止日文、日語的使用，對於受日本教育的整個台灣智識階層形同文化與政治的雙重禁錮。何義麟認為，這段禁用日文的歷史過程，也是台灣社會菁英戰後追求「去殖民」（de-colonization）的挫敗歷程。接踵而來的政治戒嚴，讓這群「日本語人」在知識與精神層面都受到禁錮，造成影響深遠的精神創傷（何義麟，2005.07：7）。對吳濁流一輩「日本語人」來說，要繼續書寫，就必須在已進入中、壯年的階段後步履蹣跚的奮力於艱辛的語境轉換，除了極少數的例子，他們絕大多被迫陷入長期的「沉默」。嘉義蘭記書局的創辦人黃茂盛（何義麟，2008），張超英之父張月澄（陳柔縉，2006），以及張文環（戴國輝，1992：335-336）等都是顯著的例子。

吳濁流雖然從祖父吳芳信、新埔公學校漢文教師（吳濁流，1988：56-57）、客家山歌文化（褚昱志，2010：47-48），以及與師範學校同窗相互切磋（吳濁流，1977d：32），累積了深厚漢文素養，戰

後卻因為無法以「國語」流暢表達，連所受日文教育也被貶為「日本遺毒」。吳濁流曾經不平的對同為客籍的歷史學家戴國輝說：「阿山能說日本話，留學過日本的算是人才，我台籍人士能說日文的卻被貶為日本遺毒產下的奴才。」（戴國輝，1992：339）當時受日制教育的台籍知識精英日文往往比中文好，這是五十年殖民體制下接受日制教育不可避免的結果，但在光復初期，對受日制教育者卻出現「被奴化」的論述（鄭牧心，1987：76-78），吳濁流因此發出上述不平之鳴。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節當天，台灣所有報紙日文版同時被禁。吳濁流雖然努力將他在二戰後期冒死寫成的《亞細亞的孤兒》（日文）分篇逐一出版（吳濁流，1995：143），但第五篇尚未出版，二二八事變就發生了。之後這部用日文寫的小說，淹沒於政治控制的文化荒煙漫草下，中間雖然在日本獲得機會出版，但一直到1962年才得以中文面貌問世。<sup>[5]</sup>

## 二、在報社當記者與編輯

以文學家令名行世的吳濁流，在二戰期間及戰後陸續當過約五年的新聞記者。分別是：1941-1942（42-43歲）到南京日軍佔領區擔任《大陸新報》記者，1944-1945（45-46歲）任台灣《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報》記者，1945八月，日本投降後繼續擔任由《台灣新報》改組的《台灣新生報》日文版記者、校對組主任，1946《台灣新生報》日文版停刊，轉任《民報》編輯，至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民報》被停刊為止（〈吳濁流年譜〉〔吳濁流，1977d：207-220〕、《無花果》、《台灣連翹》）。<sup>[6]</sup>

吳濁流是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的，所以畢業後依照規定，進入日制公學校教書，卻因為在好幾個場合中勇於表達出自己的看法，教書生涯無法免除一再被貶謫的命運。<sup>[7]</sup>會進入報社成為一名新聞記者，對吳濁流而言其實是生命中的一個巧合。由於對日本殖民體制系統性的歧視台灣人非常反感，他在1941年西渡中國大陸，希望能像師範同學鍾玉壽（在兩本自傳中化名「章君」）那樣在大陸工作發展，但卻如前述遇到語言的挫折，因緣際會的進入了日本人辦的南京《大

陸新報》當記者，從下面所引的文字中，可以看出，相較於殖民地小學教師，記者工作是個讓他感到自由、豪邁，增廣見聞的職業，當時已經四十一歲的吳濁流感到：「記者生涯對我來說是完全新奇的世界，一切我都得從頭學起。天天忙迫緊張，也沒放棄北京語的學習，渾身幹勁。」（吳濁流，1988：130）

尤其在報社中待遇與日本人相同，不再有日台之別，是讓他感到最愉快的一點。而且同事中不乏學有專長、識見不俗，具開明世界觀、毫無人種偏見的俊彥之輩，與在台灣的公學校教員，相差有若霄壤。（吳濁流，1988：130）但記者工作也使他很快看清日本佔領區下的中國人，比起殖民地台灣的中國人更可憐。記者對時局的敏銳讓他預見日本即將戰敗，1942年三月，吳濁流攜家眷回到台灣後，先是在「米穀納入協會」的「苗栗出張所」工作，趁工作空檔，陸續在《台灣藝術》上發表了後來集為《南京雜感》（吳濁流，1997b）的文字，並透過該刊總編輯江尚梅的介紹（吳濁流，1977d：169-172），1944年進入《台灣日日新報》擔任記者，開始他第二段記者生涯，主跑北警察署、皇民奉公會。

他剛進官營的《日日新報》不久，日本總督府對戰時輿論施行進一步控制。「六報合併」後吳濁流被分派到《台灣新報》文化部，當時林獻堂的次子林雲龍雖掛名部長，但並不積極管事，四批文化欄篇幅都交給吳濁流發揮，他利用版面，邀集自由派反戰學者，大搞「現實暴露」：

我每天都去找些大學教授和日人進步份子邀稿，大搞我的現實暴露。……金關教授便撰文說：「美國的大學教授薪給大概是日本大學教授的七倍，故此應該推斷他們的物資也有七倍。」另一篇是中村三八夫教授寫的「煮蛋」。由於實施統治經濟，蛋都「供出」到軍部去了，國民大眾絕少有蛋的配給。孩子們還沒有看到過蛋，因而不知煮蛋為何物……是篇諷刺了統治經濟的上乘文學作品。發表次日，有皇民奉公會和一位領導「桔梗俱樂部」的女子青年團團員前來抗議。……（吳濁流，1995：140-141）

但到了戰爭末期，因為紙張短缺，以及偏向戰爭消息報導，文化欄逐步減少而終於消失。因為每天還是得去報社上班，而當時台北遭受空襲日亟，吳濁流乾脆每天跑到非轟炸目標的台灣大學前身台北帝國大學去，一方面當作躲警報（台大校園確實未曾在轟炸中受損），一方面透過帝大教授們的收音機，可以聽到國外關於最新戰況的廣播，順便跑新聞。在此階段中，他結交了在文學上給他許多鼓勵與建議的工藤好美教授。但對他相當看不起的一班御用學者，也藉機反唇相譏。有一次擔任皇民奉公會顧問的永井教授在工藤的研究室聊天，在吳濁流面前批評台灣的記者見識不足，吳濁流反擊以：

是啊。新聞記者原來是猴子，在樹上才能演各種戲的，到樹下便不行了。現在的台灣的新聞記者，全都從樹上掉下來了。這還不算，又被人豢養著，所以實在可憐，什麼也不能靠自己的意識來做，當然顯得無能了。可是如今呢，不只新聞記者，連有自由之身的學者，都成了被豢養著的人啦。（吳濁流，1988：146）

這段期間，吳濁流經常以報社文化記者身份，出席工藤好美教授家中每月十五日舉行的定期文學座談會，除了帝大的自由派日本人教授們，當時經常受邀參加的台灣文化人及知識份子還包括王白淵、龍瑛宗、呂赫若、張文環、張泉和、劉清烈等人，畫家李石樵也露過幾次面（吳濁流，1995：145）。因為擔任新聞記者的特殊身份，吳濁流得以親會當時台灣的許多文化界精英。在此同時，他也在工藤好美的不斷鼓勵下，於工藤返日後，陸續完成了他的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吳濁流，1997a）。

戰爭末期，因為美軍對台大轟炸，1945年3月間，吳濁流向報社請病假回鄉與家人會合避難，六月中旬正式辭職（吳濁流，1988：156）。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透過廣播宣佈投降，吳濁流馬上奔赴台北報社，發現《台灣新報》的日籍幹部已經將報社運作立刻交給了六報合併前原屬《興南新聞》的台籍同事們，他回憶這段經過：

不愧是報社，動作是迅速的。來自大阪《每日新聞》的人們已經主動撤去了雙手，交棒給興南新聞。我會見了社長羅萬俤，羅社長說要發行中文的，必須有翻譯的人手，要我重返報社。於是我復職，成為編譯部的記者。（吳濁流，1995：150）

第三度成為記者的吳濁流，面對的是日人撒手、國府接收前的一段（約四十天）無政府真空期，以及因為光復而急遽變化著的台灣社會，留下了第一線的觀察紀錄：

六百萬島民都十分興奮熱切地希望能立刻把台灣改換為比日本時代還要好的一所樂園。……高舉著「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的理想邁進。島民似一日千秋，又像孤兒迎接溫暖的母親般的心情，等待著祖國軍隊的來臨。（吳濁流，1988：160）

當時報紙的控制權從日本人手裏交回原《興南新聞》的台灣人陣容手中，吳濁流形容他當時：「由於能夠盡情自由地寫新聞的關係，心情就像是小鳥飛出鳥籠一般。」（同上引：162）他目睹台灣人民對祖國接收官員的熱烈歡迎，親身參與台灣第一次慶祝中華民國國慶日在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的慶祝典禮。他也懷著無比興奮的心情，參加了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山堂（當時稱「公會堂」）舉行的受降典禮，他滿懷感動的寫著：「從今以後，一定要建設成比日據時代還要美好的台灣，成為一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這不僅是我一個人的理想，也是全台灣的民眾，六百萬島民的熱望（同上引：172-173）。

吳濁流激動的心情，代表了當時台灣許許多多智識份子的心聲，他描述當時報社同事們的士氣很高：

記者們都為了使台灣比日本時代更好，以建設模範省為努力目標，……光復當初，上海的輕薄風潮決了堤般地流進來。我們為了堵此奢靡之風，個個全力以赴。上海的商人在西門

町大世界館隔鄰開了一家國際飯店，幹起舞廳生意。我們以堂堂筆陣口誅筆伐，……效果很快地顯現出來了，生意一落千丈。……有人公車私用，載自己的小孩上下學，便寫出車牌號碼，指摘其公私不分。（吳濁流，1995：155-156）

在戰後到二二八事件發生前的短暫期間，台灣的報紙確實是自由的，言論方面較之文明國家並不遜色。而當時的報社記者「個個以社會的木鐸自許，也以此為傲」（同上引：156）。

### 三、不容青史盡成灰

終戰至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吳濁流先是在由《台灣新報》改組的《台灣新生報》工作。當時《台灣新生報》為了繼續出日文版，將原《台灣新報》的記者全部留用。原本做日翻中工作的吳濁流，改為擔任中文譯成日文工作。除了觀察社會上的各種不平亂象，吳濁流切身感受到的是外省來台人士與台籍同胞竟然同工不同酬，情況甚至比日治時代日本人與台灣人的差別待遇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了爭取同工同酬，吳濁流被當時新生報日文版同事推派去見社長李萬居，但會面的過程並不愉快。<sup>[8]</sup> 吳濁流敢言的性格，讓他在戰前不惜拂逆公學校長官，戰時對台北帝大御用學者反唇相譏，戰後又當面向李萬居理論新生報本省同仁與外省同仁同工不同酬問題，可說是「吾道一以貫之」。

1946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節，新生報日文版廢除，讓這個在吳濁流看來，被台籍記者「當做民間報紙來辦」（吳濁流，1995：172）的新生報日文版正式走入歷史。當時日文版遣散記者，李萬居曾主動表示要介紹吳濁流到公賣局任職。吳濁流對此事的解讀是，他能寫中文，理應被留用，因為在前述爭取同工同酬事件中得罪了李萬居，所以李才藉日文版停刊將他排開。但或許對吳濁流而言，當記者果真是個有趣的工作，離開官營新生報才半個月，就在王白淵的力邀下，又進入了以「文化協會」核心人物為班底的民營《民報》當編輯（同上引）。

民報的掛名社長是台大教授林茂生，主筆是早在日治時代就在《台灣民報》以「冷言」專欄知名的黃旺成（王世慶，1991）。民營的《民報》財務困難，發行僅四、五千份，但因為沒有公營的包袱，言論相當受讀者歡迎。他描述《民報》待遇雖然不好，但同仁卻對工作充滿熱忱，辦公室氣氛明朗，彼此合作無間（吳濁流，1988：207）。他到民報任職後不久，就發生二二八事件：

二月二十七日，我像平常一樣在報社編輯三版的消息。晚上八點鐘左右，根據匆忙回來的外勤記者說：今天公賣局查緝員葉德根等六個人以及警察大隊四個人……激憤的民眾湧到警察局，要求把兇手抓出來槍斃，但負責人出來聲明說，會把犯人逮捕後交給法院處理。但民眾卻不相信。……於是堅持到深夜也不解散。第二天早晨還拿了大鼓來敲打。起初是在延平北路騷動，民眾就越集越多。……到了中午，不知誰的提案，以大鼓和銅鑼在前頭，集合了長長的隊伍，向陳儀長官陳情，隊伍從延平北路蜿蜒地向城內進行。……當排頭逐漸接近長官公署之際，突然從長官公署的屋上機槍開火了。……是日下午，警備司令部宣佈臨時戒嚴令。……這就是所謂的二二八事件。（同上引：214）

之所以不厭其詳的引述這段《無花果》中的記載，是因為根據吳濁流自撰年譜（吳濁流，1977d：207-220），這本書完成於1968年，先在他辦的《台灣文藝》十九期、二十期、二十一期分三次登完，並且隔年由林白出版社印行單行本。因為書中提及在當時仍為禁忌的二二八事件，所以單行本一出即遭警總查禁。在那個年代，寫出這樣的內容，需要很大的勇氣。對比同一時期（民國五十六年），曾經與吳濁流在《台灣新報》共事的葉榮鐘，在他的〈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一文中，對陳儀治台雖頗有微詞，但卻只寫到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底參加丘念台所組織的「台灣光復致敬團」前往大陸謁拜中山陵為止，二二八事件未見一字，可見當時這是碰不得的部份。但吳濁流卻執意把它寫了下來，還想盡辦法發表。書名《無花果》，應是已經想見此作品只有「在人家看不見的地方開花吧」（張良澤，1988：12）。

根據張良澤的描述，《無花果》的完成，對吳濁流而言意義非常重大：「它意味吳濁流看穿了生死戒懼，而大義大勇地做了歷史的見證人。我敢大膽的說：《無花果》是吳濁流有意留給後人的較為完整的『遺言』」（同上引：8）。吳濁流自己是這樣說的：

回顧我走過的人生路程雖然平凡，……對於二二八事件，卻不能不有所反省。最近痛切的感到的是，當時的新聞記者，一年比一年減少了。即使尚在人間的，不是轉業就是隱居，幾乎都已和筆絕緣。視野比較廣闊的新聞記者如果不執筆，將來這個事件的真相，恐被歪曲。……當時我是民報的記者。在這之前是台灣新生報的記者，所以在了解事件發生前後的關係上，正佔有很方便的立場。（吳濁流，1988：33-34）

他當時向鍾肇政透露自己的寫作計畫，鍾為之大驚失色，因為：「此時此地，可寫的事多矣，唯獨二二八該是禁忌中的禁忌，誰敢去碰這種事！……至少在我，在那個階段，連想都不曾想過要寫二二八。」（鍾肇政，1987：2）這種智識份子的普遍驚懼在政治高壓下一直持續，直到吳濁流去世後隔年（1977），距離《無花果》完成已將近十年，張良澤在編輯《吳濁流作品集》時，仍然無法將《無花果》及最晚完成的《台灣連翹》收入。

整本《無花果》的鋪陳，其實是要以回憶錄自傳體的方式，帶出最後不到十分之一篇幅的對二二八事件的紀錄（同上引：3）。《無花果》被查禁後，吳濁流於1971至1974年之間，繼續寫了同為自傳體的《台灣連翹》，記載的範圍一部分為對《無花果》的補充，一部分則從《無花果》記載的二二八事件再往後延伸至1949、1950年國府遷台前，其中最大的驚人之筆，是關於二二八事件中被逮捕的台籍精英名單，係由「半山集團」提供的驚人內幕。<sup>[9]</sup>從這段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吳濁流根本是以新聞記者探究事情真相的精神，在進行深入的調查報導！如果不是環境限制了他，他很可能成為一個拔卓的報紙專欄作家或社會評論家（葉石濤，1991：274-275）。吳濁流晚年強忍腳部神經痛，伏案完成了《台灣連翹》。他在自序中說：

雖停停歇歇我仍然執拗地寫，自問，為何要這樣做呢？因為自民國三十六年至三十八九年，這段時期社會很複雜，年青（輕）作家身無歷其境，極難了解其時代背景，如果老一輩的作家不寫的話，其真相實無可傳，……我想到此，不知不覺地似乎有一點責任感，所以也不自量力著手寫起，……（吳濁流，1995：259）

從這些字裏行間我們不難體會到，吳濁流實在是以一個報社新聞記者的心情與敘述筆法，在白色恐怖氛圍下，台灣社會「可怕的緘默」中（橫地剛，2007／金培懿譯，2007：244），懷抱著「不容青史盡成灰」的使命感寫下《無花果》與《台灣連翹》的。彭瑞金也指出，吳濁流寫《無花果》、寫《台灣連翹》，都說明他「歷史優先、文學其次」，認為文學應不計任何代價，為它存在的時代留下見證的文學觀（彭瑞金，2000：16-17）。

#### 四、「亞細亞的孤兒」意識

吳濁流的生命經驗相當程度可以代表從日治階段過渡到國府統治時期的台灣智識階層在自我認同上的錯位與掙扎。在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求學時，吳濁流逐漸開始其自我認同的內心世界探索之旅。在國語學校長達十八天前往日本「母國」的畢業旅行中，他發現日本本土的日本人，並不像在殖民地台灣的日本人那樣具有優越感，而體悟到殖民統治的不平等本質：「日本旅行歸來之後的我們，對民主主義這新思潮熱血沸騰起來」（吳濁流，1995：41）。這民主主義的憧憬剛開始時經常與源自童年生活經驗、隱約的民族主義相接合，他曾描述日本殖民體制下台灣人對前祖國中國的思慕之情：

以一種近似本能的感情，愛戀著祖國，思慕著祖國。這種感情是只有知道的人才知道，恐怕除非受過外族的統治的殖民地人民，是無法瞭解的吧。這種心情，在曾是清朝統治下的人，是當然的，像我一樣在日本統治台灣之後才出生的人，也會有這種心情，實在不可思議。（吳濁流，1988：40）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人為鼓吹台人投入對中國作戰，在台灣各地召開「暴支應懲」的演講會，當時三十七歲的吳濁流，描述當時台籍教員：「嚐到無法說出口的痛苦，沒有叫祖國的自由，完全像奴隸一樣，而且又被置身於不能不向祖國的敵人忠誠的地位。」（吳濁流，1995：93）但殖民地智識份子的心理狀態比單純的思慕祖國更為複雜。吳濁流曾談到自己穿著正式和服的經驗，以及在當時情境下，不禁對殖民者文化優越性產生某種微妙認同的心境：

換上和服的妻子，完全像是個將出嫁的日本新娘，而且在我看來好像年輕十歲的樣子。……我穿上和服的樣子看起來酷似日本紳士，每當取出來欣賞之際，我會感到某種矛盾。（同上引：96-97）

但與這種不自覺地對統治者優勢文化產生微妙認同矛盾的是，殖民者的歧視總是無所不在。吳濁流在公學校教書二十年的過程中，一直不斷與這種歧視對抗。這種對殖民統治的不滿，讓他終於在昭和十六（1941）年一月，獨自一個人跑到大陸去。但他很快發現，祖國也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當我憧憬著那四百餘州廣闊無際的土地上，有著自由而遠涉大陸，沒有想到中國大陸上也是屬於日本人的天下……像上海、南京，戰爭早已過了四年的時間，可是街道上卻清晰地遺留著戰爭殘骸的陰暗影子。街頭上，那些成群的乞丐們、失業遊民……簡直就是家破人亡的人間地獄！……我以為只要走出台灣，就和飛出籠中的鳥一樣自由，可是現在的大陸，竟和台灣一樣，背後有日本憲兵的眼睛在閃爍。（同上引：103-104）

逃離了台灣，卻逃不出日本人的掌控，甚至逃不開日本人的歧視。他剛到南京時，因為還不能說北京話，曾在日本的南京會議所擔任中文日譯的工作，待遇雖好，但卻因為遭受一位日人「書記頭」市來的

歧視對待，只做了十天就憤而辭職（吳濁流，1988：126-128）。另一方面，日本佔領區的中國人，對來自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人，則往往視為非我族類的間諜，甚至不敢表明自己是台灣人（吳濁流，1995：103-104）。在台灣被日本人視為二等公民，到了中國又往往被當成日本間諜，吳濁流來到祖國，才理解到，台灣人民置身在歷史夾縫中的困窘處境。原先對中國的思慕之情，在經歷南京之行的親身體驗之後，逐漸轉化為日後表現於他小說中的一種「亞細亞的孤兒」意識。這種「被遺棄、沒有歸屬感的概念，已成為思考和定義台灣現代史的強力隱喻。」（Ching, 2011 / 鄭力軒譯，2006：241）

荊子馨指出，「孤兒」一詞所引發的，其實是父母的「缺席存在」，孤兒對父母的欲望通常都是直接的，是反覆沉浸在失落與孤獨這兩種感覺之中卻又不斷厭棄這種感覺的結果，是兩者的衝突而非調和。這種既憤怒又哀傷的衝突感，塑造了台灣的集體心理形構（同上引）。透過對吳濁流最具代表性的小說作品《亞細亞的孤兒》的研究，荊子馨所剖析，小說主人翁胡太明夾處於「支配性的日本殖民現實、殘存的中國想像以及浮現中的台灣意識同時出現的那種緊張、差異與競爭」（同上引：276），也同時是吳濁流自身及其同一時代台灣知識份子處境的寫照。

陳映真曾經以「『優柔不斷』、『袖手旁觀』、中庸主義、逃避觀望的知識份子的悲劇。」（陳映真，1977：53）來形容胡太明，以對比於《亞細亞的孤兒》一書中其他幾個毅然投入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行動的角色。相較於陳映真對胡太明未能堅持「民族大義」的嚴厲態度，鍾肇政與尾崎秀樹則傾向於認為「胡太明可以說就是台灣知識分子的平均人物」（尾崎秀樹，1973：78；鍾肇政，1976：66），是「日本統治下，台灣知識份子的典型……讀過這長篇的台灣知識份子，在胡太明的痛苦裏找到自己的痛苦，一定也在其快樂裏發現了自己的快樂。」（尾崎秀樹，1973：78）呼應這些看法，宋澤萊在《台灣人的自我追尋》一書中，也認為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一書中的主角胡太明角色，是「台灣人為自己真誠描下的第一個圖像」，使台灣人反省了他的本質——孤兒（宋澤萊，1988：18）。

1940年代這未解蒼茫悲憤的「孤兒意識」，自然並不等於1970年代之後逐漸出現於台灣社會的「台灣意識」，但作為一個初期的肇始，對後來的台灣社會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彭瑞金曾分析這種「孤兒意識」的發展軌跡，認為在《亞細亞的孤兒》這部作品中，「孤兒意識」尚膠著在不可知的茫然裡，只是「思考的出發，卻絕不是成型的思想體系」（彭瑞金，1986：63），但其稍後完成的〈黎明前的台灣〉（吳濁流，1997c）、《無花果》，則是建立在關注台灣前途的同一主題下，是對台灣人的命運及如何掌握命運的感思與建言（彭瑞金，1986：63）。對此，陳芳明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認為，吳濁流是歷史的先行者，他的心路歷程也是許多台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他們心目中「曾經存在著兩個中國：一個已經是死滅了的，另一個則從未誕生過。」（陳嘉農，1991：9）他認為，吳濁流晚期的作品中已經放棄青年時期對父祖之國的憧憬：

他深知，他一度眷戀過的原鄉，很早就消失在時光的長流。  
他依戀的書香，他擁抱的漢詩，他崇尚的禮儀，確實存在過——  
存在於遙遠的、文字記載裏的古國。他的憧憬其實是一種神遊。  
一旦夢醒時，他只有喟嘆自己是歷史的孤兒（同上引：10）。

施正鋒則從認同的「建構論」角度直接指出，透過《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台灣連翹》這幾部作品，「吳濁流其實是在嘗試塑造嶄新的台灣人認同，企圖進行台灣民族意識的重新建構，為台灣民族運動作動員」（施正鋒，2000：159）。張良澤更以「萌芽期」、「成長期」、「批判期」來解讀吳濁流的「台灣人意識」發展階段，認為吳濁流在〈黎明前的台灣〉中所指的台灣人「就是『住在台灣的人』，只有移住的先後，沒有本省、外省之別。」（張良澤，1988：29）

對於「亞細亞孤兒意識」作為1970年代之後所出現之「台灣意識」的歷史濫觴，反對的聲音也有不少。像陳映真便主張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是一呈現「中華民族抵抗帝國主義的精神和心靈的歷程的文學作品」（艾鄧，1977：59），極力反對以「亞細亞孤兒意識」作

為「台灣人意識」前身的各種論說，他引用日本學者村上之行的話說：「世界上沒有所謂的台灣人。假如有的話，那是住在深山裡的番社的人吧！普通被稱為台灣人的，實在完完全全是中國人。」（同上引）除了陳映真，還有王曉波。王曉波認為，吳濁流的「客家人意識」乃是漢民族意識，符合地方主義匯聚合成一民族主義的規律（王曉波，1986：274）。他批評張良澤把吳濁流的文學局限於台灣意識層次，是對吳濁流文學的「窄化」與「矮化」（同上引：275）。王曉波還曾以此論點抗議國府以「挑撥民族情感、散播分離意識」為由查禁《無花果》一書（同上引：91-115）。

另一位不同意者是石一寧，他認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台灣伴隨政治自由化而來的分離主義思潮「不僅在民族認同上自我顛覆，而且還顛覆他人。……武斷地將前輩作家與『台獨』的歷史資源劃上等號，……」（石一寧，2008：395-396）。他將民族主義無限上綱的指陳：「一個致力維護人類基本價值與世界和平的人道者主義者，絕不可能同時是一個民族分裂的鼓吹者與參與者。文學家是人類精神家園的守護人，更有責任以自己的文字為民族和解、同胞團圓提供精神之光與感情之火。」（同上引：425）他認為吳濁流作品中所表現的「漢人意識」，「是台灣人民對祖國的一種共同想像，而這種想像正是對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新中國的共同想像的基礎和起點。」（同上引，410）1981年之後中國大陸對於吳濁流及其作品的研究明顯採納陳映真觀點，陳萬益（1996）在〈胡太明及其「孤兒意識」——《亞細亞的孤兒》兩岸評的不同點〉一文中有詳細介紹。

而這種種爭論，皆源於吳濁流小說中所試圖呈現的孤兒意識，作為一種即將或剛剛浮現的，具代表性的時代「感知結構」，其本身就是浮動與尚待發展的（邱家宜，2012）。葉石濤曾直接指出，《亞細亞的孤兒》主要描寫的就是台灣人的認同危機（葉石濤，1990：9），但他認為，吳濁流明顯的指出了台灣人身上「中國意識」和「台灣意識」的韻韻，但小說的某種曖昧性卻讓爭論的雙方都可以據以爭辯，而留下「中國結」、「台灣結」的爭論空間（同上引：10）。但如果我們將「文化認同」、「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做進一步區分，這個糾纏已久的爭論，或可獲得解決。對吳濁流而言，他的文化認同是台

灣的「客家文化」、「漢文化」（中華文化），再加上從日本殖民地教育所接受的現代性世界觀；他的民族認同則始終是「台灣客家人」、「漢民族」；但他的國家認同則從童年承襲自祖父的「復中興」意識，到中期浮現的「亞細亞孤兒意識」；至後期則逐漸轉為「台灣主體意識」（邱家宜，2012：143）。

無論如何，光復初期短短幾年間的變化，確實讓吳濁流對祖國的天真憧憬徹底幻滅。想像中會帶來撫慰的祖國應許並未實現，卻見追求「五子登科」的國府接收人員湧入；禁用日文讓本省智識階層對公共事務面臨「失語」窘境；二二八夢魘，與接下來的長期政治戒嚴，讓原本對台灣光復充滿熱情的吳濁流，決定再度以日治時代的遁世姿態，來表達消極抵抗。1947年，他在幫助同學的弟弟參選國大代表後，對台灣的政治徹底灰心：

我發了一場選舉熱，……說起國民大會代表，全國三十五省，共達一千八百名之多，其中台灣省選出的名額，只有十九人，而且候選人幾乎都是國民黨員，……其後二十餘星霜，任何選舉我都不投一票……只要憲法未被完整遵行，我便不打算投我的一票。（吳濁流，1995：221）

吳濁流的心境應可相當程度代表整個世代的台灣智識階層共同的心路歷程。光復前傾慕的祖國溫暖懷抱並未如預期實現，對寫下〈黎明前的台灣〉時（根據吳濁流在該文末的註記，該文完成於1947年6月，亦即二二八事件之後不久）的吳濁流來說，黎明終將到來，但黑夜尚未過去。他以及他所代表的一群台籍智識份子，從當時的報業生態中完全缺席，於今看來，正傳達出一股「失落的世代」的強烈訊息。

## 肆、在「選擇性傳統」中「失落的世代」

### 一、同輩本土報人的命運

吳濁流當然不是唯一的例子。曾是日治時期唯一由台人創辦的《台灣民報》一系列報刊中之靈魂人物的林呈祿（1886-1968），在日治時

期的文化運動與議會請願運動中均為要角（王詩琅，1991），以他在台灣報業的顯赫資歷，戰後卻僅象徵性的擔任了《台灣新生報》顧問、董事等閒職，而不再有機會真正涉足報業。他晚年在接受口述歷史訪問時最後提到：「我一輩子，日據時期的半生中，可以說都是獻身民族報業的建立和這民族運動，所以如果要說值得提起的事，就是這兩件事。」（同上引：44）一個曾以辦報為終身職志的人，最後卻被摒除於執著獻身的報業之外，其巨大遺憾意在言外。

另一個戰後歸於沉寂的本土報人，是曾經擔任過台籍大老林獻堂秘書的葉榮鐘（1900-1978）。葉與吳濁流同年，是日治晚期知名的記者，一手流暢的白話文讓吳濁流非常佩服（戴國輝，1992：336）。他從1935年進入當時台灣民族運動的言論機關《台灣新民報》，擔任過通訊部長（編譯組主任）兼論說委員（主筆）、東京分社社長、文化部兼經濟部長，1943年被大阪每日新聞「借調」到當時日本佔領的菲律賓去創辦華文僑報《華僑日報》一年多，終戰前仍服務於六報合併後的《台灣新報》，擔任文化部及經濟部長（王大佑，1983；戴寶村，1990）。葉榮鐘在戰後也不再有機會任職新聞媒體，1946年受省立台中圖書館館長莊遂性之邀擔任研究輔導部長兼採編部長，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去職（戴寶村，1990：181）。

葉榮鐘曾經為好友羅萬俔（1897-1963）作傳（葉榮鐘，1985），提到他從1928年開始負責實際經營林獻堂掛名領導的《台灣民報》（該報最早從東京行旬刊、周刊開始發軔，後移回台灣發行），與日本人周旋擘畫，終於得以發行台灣人自主發聲的《台灣新民報》日刊。戰時「六報合併」後，由日本人掌握報務，羅萬俔以副社長職位象徵性代表台灣人參與管理階層，所以葉榮鐘說他「在本省光復前，可謂與報業相始終」（同上引：184）。戰後擅長經營的羅萬俔轉入財經領域，與國府也一直維持良好關係，但不再涉足報業。

戰後參與創立《民報》，並擔任主筆的黃旺成（1888-1978），是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位台灣本土報人。從日治時期就積極參加「台灣文化協會」的各項運動，曾擔任《台灣民報》記者八年（王世慶，1991；莊永明，1990；陳逢申，2008）。二二八之後，他一度避禍上海，雖免於被捕，但回台後就沉潛於省文獻會（當時稱「通志館」）所屬

新竹縣文獻會，終生未再涉入報業（莊永明，1990：93-96）。黃旺成所留下來的的大批日記，在由其親族晚輩同意捐出後，目前仍由中研院近史所許雪姬研究員所領導的團隊進行整理、解讀中（許雪姬，2009）。

與吳濁流輩份相當，也都曾活躍於日治時期的本土報人中，二二八之後唯一得以再出現於台灣報業舞台的是吳三連（1899-1988）。留學日本，曾經在日本擔任大阪《每日新聞》記者的吳三連，是戰後台灣本土智識份子中最具新聞專業資歷與能力的人士之一，但在戰後卻轉而經商、從政，也因此幸而避過二二八後國府對新聞媒體的大整肅。同樣成長於日治台灣，吳三連在戰後的際遇，經由報業以外的場域，分享了國府霸權的政治與經濟利益（吳三連，1991），相當程度避免了「失落的世代」的噤聲失語處境，但他在某種程度上卻與吳濁流具有相同的「感知結構」（邱家宜，2012：153）。1960年他一度加入雷震、李萬居等人的組黨運動（吳三連，1991：226），其做為日治時期成長之台灣本土智識分子的相關質素，從1959年開始，經由入主《自立晚報》的經營，又一點一點的浮出於台灣報業舞台，直到1988年報禁解除前，該報都扮演著維繫台灣新聞媒體在野精神與本土性格之香火的角色（呂東熹，2010：341-372；吳三連，1991：166-169，294-295）。

## 二、失落的世代

歷史學家周婉窈曾經以法國年鑑學派史家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的「世代」觀念來理解戰後台灣的智識份子群體。關於世代概念，布洛克是這樣說的：

大約同時生在同樣環境中的人，必然受到類似的影響，尤其是在他們的成長期。……這種來自同一年代的共同烙印正是造成一個世代（generation）的東西。……世代的週期絕不是規律的。當社會變遷的韻律或快或慢時，世代之間的邊界也隨之縮小或擴大……世代這個觀念是非常有彈性的。它與那些我們感覺非常具體的事實相配合。（Bloch, 1953 / 周婉窈譯，1989：171-172）

周婉窈認為，乙未（1895）割台後，台灣出現了「遺民世代」（例如吳濁流的祖父吳芳信）與「乙未新生代」。二次世界大戰則塑造了台灣的「戰爭世代」。她所界定的「戰爭世代」是童年介於從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之間的世代，由於當時傳統書房教育已經式微，日制初等教育相當普及，及齡兒童就學率將近五成。教育的一致性造就了認知的一致性，加上日本在戰時為了加速台灣的日本化，採行「內台合一」政策，對當時成長的青少年影響相當深遠（周婉窈，2009：9-11）。

周婉窈點出這「戰爭世代」在 1945 年台灣歸還中國後，卻成為「失落的世代」的時代悲劇：

在一般的情況下，成熟的世代輪流掌握社會的主導權，只是時間長短不一。不過，在特殊的狀況下，有些世代失去主導社會的機會，成為「失落的世代」（lost generation），……就此而言，台灣的戰爭期世代，也是一個「失落的世代」。他們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的變局中，失去了辛苦學得的語言和文字，以及附著在這個語文的教育資產；他們當中許多人在新社會變成文盲。教育資產的喪失還是其次，最嚴重的是，在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中國的統治下，他們被迫對自己的過去與群體的過去，保持近乎絕對的沉默。（同上引：12）

相較於周婉窈僅在論文集序言中提到世代概念，作為理解其研究成果的一個建議。蕭阿勤曾經對影響台灣社會的世代現象做過較有系統的研究（蕭阿勤，2008）。他引述德國猶太裔學者 Karl Mannheim 在 1920 年代末從知識社會學立場所提出的世代概念（同上引：16-24），來解釋台灣戰後到 1970 年代初期所蓬起的「回歸現實」的世代。Mannheim 將世代概念再區分出「世代位置」（生長於同一歷史與文化地區的同齡群體）與「實存世代」（an actual generation，參與了動盪的社會與時代中具有特色的社會知識潮流的同齡群體），以及面對同一動盪潮流採取不同因應態度的「世代單位」（generation unit）三個層次（同上引：18-20）。蕭阿勤透過豐富的史料引述與分析，以「實存世代」的分析層次，將台灣 1960 年代在高度政治監控與體制化教育

下成長的一代知識青年稱為「消極沉默的一代」（同上引：66-101）；而將 1970 年代初期，經歷保釣運動所開始掀起的一連串政治社會改革訴求，以及與省籍與國族敘事相關的歷史意識覺醒的同時代知識青年，稱之為「回歸現實世代」（同上引：101-139）。但吳濁流顯然並不在蕭阿勤所分析的戰後世代範圍，反而更能呼應周婉窈所點到的，經歷日本殖民經驗與戰後初期政治、社會動盪，而在 1940 年代後期開始明顯陷入長期沉默的「失落的世代」。

其實，吳濁流身處的歷史時點，比周婉窈界定的「戰爭世代」大約還要早十年。1920 年，他已經完成整個日本殖民政權對台灣人所提供的制式教育，從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了。或許因為早了十年，以及生長於舊傳統強大的客家族群中，他對於「變成日本人」一事始終心存抗拒；但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完整的日本教育，所能掌握的「知識語言」（母語客語是「生活語言」）其實是日文。如同周婉窈所分析的，隨著台灣歸還中國、日語被禁用、報紙日文版被廢，原本在《新生報》日文版任職的吳濁流被迫轉入被台籍智識分子（包括作者與讀者）視為輿論陣地的《民報》工作。而當二二八發生後，曾與統治者就台灣人是否被日本殖民「奴化」展開激烈辯論的《民報》也走入歷史。吳濁流最終也加入了這「近乎絕對沉默」的行列。所幸他改以小說體例繼續低調創作，以及兩本在戒嚴時期屢屢被打入禁書的自傳（《台灣連翹》與《無花果》），從解嚴前便已經在地下廣為流傳，為日後的研究者留下了不少線索。

但與吳濁流有類似生命處境的台籍智識分子，絕大多數卻都不得被迫陷入沉默：「他們一直沉默著，直到這個世代以加速度的腳步凋零時，才開始發出聲音。他們是歷史的失敗者，在中壯年期未得身居社會的主流。」（周婉窈，2009：12）不過，在公共場域中的沉默，並不表示在私領域中也一貫的沉默：

這個失落的世代以沉默的方式對歷史作出了尚待估量的影響。他們的沉默有些是真的沉默，一言不發；有些是在可以安全「發聲」的場所，如家庭、朋友、鄰里間，偷偷地發出聲音；……唯有適切的評估這些影響，我們才有可能觸摸到

那把我們帶到當前這個充滿糾葛的時點的歷史力量。（同上引：12-13）

值得注意的是，周婉窈對台灣戰後「失落的世代」的描述，其實並不是要強調其淹滅於歷史，反而似乎是要凸顯一些在當時看似幾乎滅絕了的歷史的殘餘因子，卻對接下來的發展產生了可觀的歷史力量。或者更進一步說，那種「沉默」，其實並不是毫無表示的沉默，而只是在公領域中完全噤聲的「貌似沉默」。吳濁流不當記者，看似沉默了，但他拼命地寫下了《無花果》、《台灣連翹》，希望替時代留見證，為歷史存線索。後來的發展，也證明他的一番苦心沒有白費。經驗告訴我們，歷史是會翻轉的，在其每個轉折處，都引導人們去重新詮釋與理解過去。為了繼續進行此一幽微的探索，在這裡將嘗試引進英國文化研究巨擘 Raymond Williams 所提出的「選擇性傳統」（selective tradition）概念。

### 三、「選擇性傳統」的運作

Williams 認為，所謂「文化」有三個層次的定義：一是特定時空的現存的文化，只有生活於當時、當地的人能充分領略；一是被記載的文化（從藝術到日常生活實蹟），屬於過去某一時代。第三種則是聯繫過去與現在，透過「選擇性傳統」運作所產生的文化（Williams, 1975: 49）。第三種文化定義，是最重要的一種，也是 Williams 的文化史研究所要鑽研的。Williams 非常強調掌握此一「選擇性傳統」概念對研究文化史的重要性，Williams 的「選擇性傳統」概念是與其「感知結構」概念一併提出的（邱家宜，2011），他認為，在「選擇性傳統」的運作下，可能會產生出具普遍性的人類文化，或者完成某一特定社會的歷史紀錄，但也可能發生將明明存在過的文化加以拒斥、掩藏的狀況（Williams, 1975: 51）。Williams 這個理解文化史的概念被教育學者用於解釋教科書內容的演變（Jerskey, 2006），也被用來理解統一後的新德國，如何面對過去分裂而體制迥異的共產主義東德與資本主義西德，對於納粹大屠殺的兩種不同歷史詮釋的問題（Wegner, 2000）。

簡要的說，就是一個社會的文化傳統並不是客觀不變的，而是經由每個世代不斷的重新建構而產生的。在一個社會中，某些特殊利益會決定「選擇性傳統」的運作方向，包括階級的利益、族群的利益、政權的利益等等。二二八事件後的台灣，我們可以明顯看出某些「選擇性傳統」的運作方向，刻意忽略日治半個世紀對台灣社會所產生的深遠影響，讓戰後成長的台灣人幾乎不認識這段剛才發生不久的歷史，甚至連「二二八事件」本身，都消失在歷史迷霧中（夏春祥，2007）。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這些隨著「失落的世代」淹沒的，其實才發生在不久之前的歷史，既不會出現在新聞媒體上，也不會出現在公共場合的各式言論中，更不會出現在學校的歷史教科書上。

經歷二二八事件後，對當時的國府統治者而言，任何將台灣社會視為不同於中國社會（民情、文化差異）、或應該等同於中國社會（享有平等國民權利），而可能危及統治權力的言論都是有害的。事件前原本相當充分的新聞自由，一夕緊縮，但緊縮的對象只針對台灣本土報人，對於黨報、官報、外省來台報人、半山報人，辦報之門依然是敞開的，報紙的家數並未減少，甚至較二二八之前更多（邱家宜，2011：150-154）。但本土報業人士，卻幾乎從檯面上消失。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選擇性傳統」透過籠罩性的整體政治力量引導，在事關社會話語權的報業發展上，發揮了強大的影響力。包括吳濁流在內的一群「失落的世代」從此消失於台灣的報業舞台，而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之間，讓人感覺彷彿這批一度極為活躍的台灣智識精英從未存在。「選擇性傳統」所發揮的力量著實驚人。

但「選擇性傳統」是一種不斷進行的過程，在某個時代被遺棄的傳統因子，只要不完全死滅，可能在另一個時代又被重新發現、提振出來（Williams, 1975: 51-52），如同周婉窈所說：「這個失落的世代以沉默的方式對歷史作出了尚待估量的影響。」吳濁流以及其同輩報人，做為台灣近代歷史上一個「失落的世代」，在公領域中大部分時候雖被迫保持沉默（吳濁流還是努力留下了他的「拼命文章」《無花果》與《台灣連翹》），在私領域中卻仍舊默默地影響著他們的親族子弟。他們以餘生默默地等待，等待威權政治的一朝鬆動，等待重新自我表述時機的到來。我們因此不難理解，1960年，當外省權貴背景的雷震

因《自由中國》言論冒犯當道，而被以窩藏匪諜論罪下獄時，吳濁流為何會深受打擊（吳濁流，1995：247），因為那意味著，威權者自我鞏固的決心與能量依然強大——需要等待的時間將會更長，也可能此生無緣得見了。

前面提到，「選擇性傳統」的運作主體，通常是一個社會中的主流利益，包括階級、族群的利益、政權的利益等等。二二八事件之後，國府政權的利益主導了整個報業傳統的運作方向。而在1988年台灣報禁解除前，強調民主化與台灣主體性的「黨外雜誌」開始冒著隨時被查禁的危險，前仆後繼的不斷出現（彭琳淞，2004），終至衝破威權政治禁錮言論的銅牆鐵壁。至此，政治民主化的壓力與新的族群政治情勢，似乎又啟動了另一波「選擇性傳統」。所不同的是，這次沒有清楚定於一尊的霸權主導其走向，歷史行動者（報人、新聞工作者），必須在新的媒體生態結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不斷與讀者（閱聽人）互動，競爭更多的社會共鳴。

報禁解除之後，長期被壓抑的本土論述，與同樣被打壓的大陸來台異議知識份子的政治批判精神，又重新獲得發言空間（邱家宜，2011：201），吳濁流所揭櫫悲情的「亞細亞孤兒意識」，作為「台灣優先論」之類強調台灣本土性政治理念的歷史脈絡，以對立於過去幾十年間「中國中心論」的姿態站到歷史的檯面上，成為台灣社會自我理解的重要參考背景。關於此一「選擇性傳統」進一步的鋪陳與發展，牽涉資料龐大，有待未來另文分析。

## 伍、伏筆與線索——代結語

在1895年乙未割台之前的清領時期，經過清朝兩百多年的統治，許多台灣的漢人仍念念不忘鄭成功所代表的明朝；乙未割台之後，台灣人開始被統治者要求學日文、做日本人，但許多台灣的漢人仍選擇讓子弟進私塾讀漢文，或學日文的同時也學漢文，展現對漢文化強烈的堅持；1945年回歸中國，台灣社會一度表現出一股對想像中的陌生祖國的回歸狂熱；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後，為了儘速適應新的霸權體系，台灣社會又表現出對日治階段所產生之社會文化影響的強烈遺

忘，但表面上的遺忘，掩藏了底層的矛盾。一個社會在短短六十年間，經歷了如此劇烈的歷史轉折，從吳濁流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層層堆疊的生命經驗與集體記憶所留下的掙扎痕跡，雖然他在二二八事件後就完全退出了新聞界，但他的生命故事卻提示了那些曾經長久被壓抑的，台灣本土報人身上所具有的潛在質素與力量。

本文以「失落的世代」來描述吳濁流以及其同輩台灣報人的境遇，呈顯其後半生所陷入的語言與政治雙重禁錮。透過「選擇性傳統」機制的運作，他們所代表的日治時期台民對文化、政治權利進行積極爭取的活動軌跡與成就，在戰後台灣的新聞媒體論述中被刻意抹去而完全消失。經過國府重新整編的台灣新聞媒體，開始全面進行強化國府領導中心，以及「反攻復國」論述的產製。直到 1988 年報禁解除前，吳濁流所代表的從日治時期即已開始發軔的一脈台灣本土報人傳統，一直被壓抑著，直到台灣社會開始進入另一個歷史階段，另一波「選擇性傳統」的運作，才讓那些一度幾乎湮沒的舊傳統中的重要質素，有機會轉化成為下一階段台灣報業（新聞媒體）的歷史資產。

## 註釋

- [1] 本文所稱報人其含意類似英文的 *newspapermen*，指為報紙工作的人，除了撰寫報導、評論之外，也包括從事編輯、翻譯、發行、業務等工作的人。
- [2] 本文使用「智識分子」來指稱受過教育成讀寫的人，相當於英文的 *educated people*，有別於具特殊意義的「知識份子」（*intellectual*）。
- [3] 1944 年三月，台灣總督府下令將《台灣日日新報》、《興南新聞》、《台灣新聞》、《台南新報》、《高雄新報》、《台東新報》等六家主要報紙合併，成為《台灣新報》，由日本的大阪《每日新聞》派員接管（吳濁流，1988：120；葉榮鐘，1985：275-276）。
- [4] 吳濁流的原稿大多先以日文起草，而後再細細推敲譯成中文（張良澤，1977：6；戴國輝，1992：335）。晚年又恢復以日文寫作《台

灣連翹》，據鍾肇政的說法，是因為：「他年紀也著實不小了，常常說長篇寫起來太吃力，還是用日文起草省力些，較可能支撐下去，這就是他仍用日文來寫的緣故。」（鍾肇政，1977：41）從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如同許多殖民地智識精英往往對殖民母國的文字能夠充分掌握，殖民者所教育的日文，也成吳濁流用以書寫的第一語文。

- [5] 《亞細亞的孤兒》最早在台灣出版時分為四部，原名《胡志明》。根據張良澤的整理，日文本的《胡志明》第一篇於1946年9月3日出版，第二篇（慈悲の卷）於同年10月10日出版，第三篇（大陸篇）在11月20日隨即上市，前三篇均由台北華國書局擔任總銷售。第四篇（桎梏の卷）開始由《民報》總社發行，於民國1946年12月25日出版（張良澤，1977：7），第五篇也委由《民報》出版，但當時正逢二二八事件發生，《民報》被封，書稿幾乎損失殆盡。所幸吳濁流手邊留有校樣，才得以於隔年（1948）問世（吳濁流，1995：171-172），但當時日文書已經開始被限制流通（何義麟，2005.07）。1956年在日本由「一二三書房」出版時，因為與當時越共領導人同名，因此改為今名（吳濁流，1977d：183-185），書中主人翁的名字胡志明也都改為「胡太明」以避免誤會。1956、1957分別由日本一二三書房（已改為《亞細亞的孤兒》今名）、廣場書房（書名變成《被弄歪了的島》）出版，引起日本文化界注目及許多讀者迴響。1959年，楊召憩譯本先在高雄由黃河出版社印行，書名《孤帆》，正文前有「本書曾蒙：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高雄市委員會（48）高市密字第1996號代電嘉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50）宣三字第0573號函嘉許」等字樣，封面並註明為「長篇抗暴文藝小說」（張恆豪，2011：40），透露出當年出版之時空環境氛圍。1962年，傅恩榮的中譯本才得以《亞細亞的孤兒》書名由台北南華出版社出版。幾乎所有關於台灣殖民文學的書寫都推崇吳濁流的這部小說，認為是抵抗日本殖民主義的終極行動與象徵（Ching, 2011 / 鄭力軒譯，2006：240）。

- [6] 吳濁流曾經說自己當過「七年」記者，但那是較籠統的算法，就是從 1941 算到 1947，把 1942、1943 他擔任「米穀納入協會」主任的時間也算在裡面（呂新昌，1996：77）。
- [7] 吳濁流在二十一年的公學校教師生涯中曾經三次被「下放」。第一次因為寫「學校和自治」的教育論文批評日本督學及教育體系，又因喜歡閱讀《台灣青年》、《改造》等雜誌，對校長與警察也不恭敬，被貶到極為偏遠的苗栗四湖公學校；第二次因為得罪同僚與四湖公學校長再調五湖分校，雖然兩年多後又被調回四湖，卻因肺部疾病休職，康復後在已經正式設校的五湖復職。在規模頗大卻因此讓日台教職員待遇不平等問題檯面化的關西公學校服務才一學期，又因為得罪校長被流放馬武督分校，是為第三次「下放」。結果因為在運動會上對日本人郡視學毆打本島人（台籍）教員的公然羞辱惡行難以忍受，決定辭職（吳濁流，1988：75-118）。
- [8] 當時吳濁流先是向李萬居討教國父「天下為公」的道理，而在他滔滔不絕的講了半個多鐘頭後，才抓住機會說：「不過社長，社員的薪水，本省人和外省人有差別，也算是『天下為公』嗎？」根據吳濁流的記載，當下李萬居的反應相當激動：「他全身發抖，哆嗦著嘴唇說：『這件事……是我規定的、不是我規定的。』」（吳濁流，1988：195）
- [9] 吳濁流與二二八事件時與陳儀不睦的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頗有私交，原本盤算可以從他那邊問出一些內幕，但 1973 年李翼中已經去世，為了探究二二八事件的前因後果，他親訪同為客家人，也是師範學校後輩，曾擔任台灣省建設廳長的彭德。吳濁流在《台灣連翹》中僅以「P 君」為代號，未言明消息來源為彭德，但如將前後相關敘述，對於照彭德生平（卜幼夫，1962：162-165），答案呼之欲出。根據彭德的說法，「外省人對台灣各地各界的領導者不可能知道得那麼詳盡。是從重慶回來的半山幹的。」（吳濁流，1995：193）

## 參考書目

- 〈談談禁用木屐〉（1946.12.25）。《民報》，2版。
- 卜幼夫（1962）。《台灣風雲人物》。台北市：新聞天地社。
- 王大佑（1983）。〈苦悶時代裏的反省——葉榮鐘與「南音」雜誌〉，陳永興、李筱峰（編）《台灣近代人物集——近代台灣知識份子的志業與理想》，頁153-163。台北市：李筱峰。
- 王世慶（1991）。〈黃旺成先生訪問紀錄〉，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71-114。台北市：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台灣大學歷史系。
- 王甫昌（1993）。《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縣：業強。
- 王詩琅（1991）。〈林呈祿先生訪問紀錄〉，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21-69。台北市：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
- 王曉波（1986）。《走出台灣歷史的陰影》。台北市：帕米爾。
- 石一寧（2008）。《真實的追問——吳濁流的文學·思想·人格》。台北市：人間。
- 江慕雲（1992）。《為台灣說話》。台北縣：稻香。
- 艾鄧（1977）。〈孤兒的歷史和歷史的孤兒——讀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夏潮》，2（1）：54-59。
- 何義麟（2005.07）。〈戰後初期台灣日文報刊的流通與管制〉，「『日本語』在台灣、韓國、沖繩做了什麼研討會」論文。台灣，台中。
- 何義麟（2007）。《跨越國境線——近代台灣去殖民化之歷程》。台北縣：稻鄉。
- 何義麟（2008）。〈近代台灣去殖民化過程中的語言問題——以蘭記書局之考察為中心〉，黃自進（編）《東亞世界中的日本政治社會特徵》，頁307-334。台北市：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 吳三連（1991）。《吳三連回憶錄》。台北市：自立晚報。
- 吳三連、蔡培火、陳逢源、林伯壽、葉榮鐘（1971）。《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市：自立晚報。

- 吳文星（1996）。〈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推廣日語運動初探〉，台灣師範大學中等教育輔導委員會（編）《認識台灣歷史論文集》，頁 257-321。台北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中等教育輔導委員會。
- 吳濁流（1977a）。《吳濁流作品集 1：亞細亞的孤兒》（張良澤編）。台北市：遠行。
- 吳濁流（1977b）。《吳濁流作品集 4：南京雜感》（張良澤編）。台北市：遠行。
- 吳濁流（1977c）。《吳濁流作品集 5：黎明前的台灣》（張良澤編）。台北市：遠行。
- 吳濁流（1977d）。《吳濁流作品集 6：台灣文藝與我》（張良澤編）。台北市：遠行。
- 吳濁流（1988）。《無花果——台灣七十年的回想》。台北市：前衛。
- 吳濁流（1995）。《台灣連翹》。台北市：草根。
- 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1977）。〈吳公濁流生平事略〉，《台灣文藝》，53：6。
- 呂東熹（2010）。《政媒角力下的台灣報業》。台北市：玉山社。
- 呂新昌（1996）。《鐵血詩人吳濁流》。台北市：前衛。
- 宋澤萊（1988）。《台灣人的自我追尋》。台北市：前衛。
- 尾崎秀樹（1973）。〈吳濁流的文學〉，《台灣文藝》，41：77-83。
- 李西勳（1995）。〈台灣光復初期推行國語運動情形〉，《台灣文獻》，46（3）：173-207。
- 周婉窈（2009）。《海行兮的年代》。台北市：允晨。
- 周婉窈譯（1989）。《史家的技藝》。台北市：遠流。（原書 Bloch, M. [1953]. *The historian's craf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周憲文譯（2002）。《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原書矢內原忠雄〔1929〕。帝國主義下の台灣。東京市：岩波。）。
- 林海音（1977）。〈序：鐵和血和淚鑄成的吳濁流〉，張良澤（編）《吳濁流作品集》，頁 35-38。台北市：遠行。
- 武安隆、王家驊（1984）。《日本明治維新》。北京：商務。

- 邱家宜（2011）。《戰後初期（1945-1960）台灣報人類型比較研究——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論文。
- 邱家宜（2012）。〈戰後初期台灣報人群體的多重「感知結構」〉，《新聞學研究》，112：117-157。
- 金培懿譯（2007）。〈一九四七年的「五四」文藝節「緘默」如何被打破？〉，黃俊傑（編）《光復初期的台灣——思想與文化的轉型》，頁 243-275。台北市：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姚大中（1988）。《日本天皇制度與明治維新》。台北市：經世。
- 施正鋒（2000）。〈戰後吳濁流的認同觀——情境條件下的台灣人認同〉，林柏燕（編）《吳濁流百年誕辰紀念專刊》，頁 149-161。新竹縣：新竹縣文化局。
- 柯志明（2006）。《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台北縣：群學。
- 夏春祥（2007）。《在傳播的迷霧中：二二八事件的媒體印象與社會記憶》。台北市：韋伯。
- 張良澤（1977）。〈「吳濁流作品集」總序〉，張良澤（編）《吳濁流作品集》，頁 1-33。台北市：遠行。
- 張良澤（1988）。〈《無花果》解析——從《無花果》看吳濁流的台灣人意識〉，吳濁流（著）《無花果》，頁 7-32。台北市：前衛。
- 張炎憲主編（2008）。《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一）——早年生活》。台北市：允晨。
- 張恆豪主編（2011）。《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02：吳濁流（1900-1976）》。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
- 莊永明（1990）。〈輿論界的尖兵——黃旺成〉，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編）《台灣近代名人誌》（第五冊），頁 85-99。台北市：自立晚報。
- 許雪姬（1991）。〈台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思與言》，29（4）：155-184。
- 許雪姬（2009）。〈編者序〉，許雪姬（編）《黃旺成先生日記》，頁 iii-vi。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 陳映真（1977）。〈試評《亞細亞的孤兒》〉，張良澤（編）《吳濁流作品集》，頁 45-60。台北市：遠行。
- 陳紹馨（1979）。《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市：聯經。
- 陳柔縉（2006）。《宮前町九十番地》。台北市：時報。
- 陳逢申（2008）。〈《黃旺成先生日記》序〉，許雪姬（編）《黃旺成先生日記》，頁 iii-viii。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 陳萬益（1996）。《於無聲處聽驚雷》。台南市：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 陳嘉農（1991）。〈為吳濁流「台灣連翹」出版而寫〉，吳濁流（著）《台灣連翹》，頁 5-13。台北市：前衛。
- 彭琳淞（2004）。〈黨外雜誌與台灣民主運動〉，《20 世紀台灣民主發展——第七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頁 693-782。台北市：國史館。
- 彭瑞金（1986）。〈從「無花果」論吳濁流的孤兒意識〉，《台灣文化》，2：61-65。
- 彭瑞金（2000）。《歷史迷路文學引渡》。台北縣：富春文化。
- 葉石濤（1990）。《走向台灣文學》。台北市：自立晚報。
- 葉石濤（1991）。〈吳濁流論〉，彭瑞金（編）《吳濁流集》，頁 269-282。台北市：前衛。
- 葉明勳（1995）。《感懷集》。台北市：躍昇。
- 葉啟政（2005）。《現代人的天命》。台北縣：群學。
- 葉榮鐘（1985）。《台灣人物群像》。台北市：帕米爾。
- 褚昱志（2010）。《吳濁流及其小說之研究》。台北市：秀威。
- 鄭力軒譯（2006）。《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北市：麥田。（原書 Ching, L. T. S. [2001].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鄭牧心（1987）。《台灣議會政治四十年》。台北市：自立晚報。
- 蕭阿勤（2008）。《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龍應台（2010）。《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台北市：天下。
- 戴國輝（1992）。《愛憎二二八》。台北市：遠流。

- 戴國輝（1994）。《台灣結與中國結——翠丸理論與自立、共生的構圖》。台北市：遠流。
- 戴寶村（1990）。〈遠識高文的政治、文化人——葉榮鐘〉，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編）《台灣近代名人誌》（第五冊），頁 169-187。台北市：自立晚報。
- 鍾肇政（1976）。〈以殖民地文學眼光看吳濁流文學〉，《夏潮》，1（9）：63-66。
- 鍾肇政（1977）。〈序：風雨憶故人〉，張良澤（編）《吳濁流作品集》，頁 39-43。台北市：遠行。
- 鍾肇政（1987）。〈拼命文章不足誇——紀念吳濁流先生逝世十週年〉，吳濁流（著）《台灣連翹》，頁 1-5。台北市：年代文庫。
- 羅敬典（1952）。〈談談台灣報業發行〉，《報學》，1（3）：101-102。
- Jerskey, M. (2006). *Writing handbooks,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and the selective tradi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New York.
- Wegner, G. (2000). The power of selective tradition: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and holocaust education for youth in the new Germany. In L. E. Hein & M. Selden (Eds.), *Censoring history: Citizenship and memory in Japa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pp. 226-257). Armonk, NY: East Gate Book.
- Williams, R. (1975). *The long evoluti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 The Lost Generation: Wu Cho-Liu as an Example of Taiwan Native Newspapermen in Early Postwar Years

Eve Chiu\*

## Abstract

This essay presents a discussion on the difficult post-war situation of people educated in the pre-colonial period, such as Wu Cho-Liu. Speechless and struggling over self identities, Wu Cho-Liu started exploring “consciousness of Asian orphans.”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Taiwan native newspapermen, he shared their heritage, and the hegemonic KMT regime repressed his career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selective tradition,” leading him to become one of the “lost generation.” However, after martial law ceased, those nearly dead heritage of Taiwan society were resurrected in a new “selective tradition” process. It shows important perspectiv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Taiwan media ecosystem.

**Keywords:** lost generation, Taiwan native newspapermen, Wu Cho-Liu, consciousness of Asian orphans, selective tradition

\*Eve Chiu is a Doctor in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s,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